

汉字部首的形成过程与机制*

王 贵 元

提要 文字学意义的部首,其本质是汉字字义和字形的类化标志,汉字部首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汉字字义和字形的类化过程,部首体系生成的主要手段有添加、选定、改造和新生。早期汉字形体多为单义构件,后期字形则多为类义构件,对早期字形单义构件的改造是构形功能发展的重要途径,主要有两种方式:转化和替换。汉字部首是在汉字构形系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非初始即已存在。战国晚期的睡虎地秦简当是整理过的文字,说明秦整理过隶书的传言真实有据,这也可解释为何秦统一全国后只整理小篆而没有整理当时普遍使用的隶书。

关键词 部首 汉字发展史 汉字整理

汉字的部首体系是汉字构形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有意识逐步建立的,是汉字构形成熟的重要标志。《说文解字》依据“字例之条”,“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 540 个部首统摄 9353 字,实际上就是顺应汉字构形系统本有的部首体系来编排字形,是一种反映汉字构形系统化关系的字形编排法。因此,与后代的部首检索法的部首相比,数量较多。后世的部首排检法更多的是出于查检方便的目的,对汉字构形系统实有的部首体系进行了人为的干预和改造归并,虽然也是依赖汉字构形系统的本有特征而设立,但与本有部首体系已严重背离。迄今为止,学界对汉字部首的研究,基本集中在部首排检法的范畴,对汉字构形系统自然生成的部首体系的发展过程和机理等尚缺乏研究,而这恰恰是汉字理论和汉字发展史研究的重要论题。

1. 部首的本质与特征

1.1 部首的本质

王力(1981:166)说:“《说文》540 部首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是文字学原则的部首,而不是检字法原则的部首。前者是依据六书体系的,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六书的体系。”这一论断是正确的。所谓文字学原则的部首实际上是指汉字构形系统固有的类化偏旁,就同拼音检字法依据的是汉字本有的字音系统一样,部首排检法依据的也是汉字构形系统本有的部首体系。许慎撰写《说文》的目的是解释汉字的形义系统,纠正当时人们胡乱解释汉字的现象,所以《说文》并不是为了提供一个供一般查检汉字形音义的字典,而是展示汉字本有的形义系统,这也是《说文》不同于其他字典,只解释一个字义的原因。因此,在《说文》时期,文字学原则的部首和检字法原则的部首是统一的。明代梅膺祚《字汇》之后,部首大减为二百多部,其目的是为查检方便,其核心是只管形体的相同而不考虑构义,也就是一部分部首只考虑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097)、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12)资助。

形体相同而不顾构义功能,造成了文字学原则的部首和检字法原则的部首的不统一。就汉字构形系统的部首而言,《说文》有过说明,《说文·叙》说:“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这实际上表明了部首并不只是形体问题,部首就其功能而言,是对字义的系统化和类别化,就形体而言,是对字形的系统化和类别化,所以部首是汉字构形系统化的重要表现,我们认为,这即是部首的本质。

1.2 部首的特征

《说文》以 540 个部首统摄 9353 字,系统化展示了汉字构形系统的部首体系,《说文》分析的主要是小篆字体,说明发展到秦代的小篆字体,汉字部首体系已经形成,那么,从部首体系已经形成的汉字构形系统来看,部首有哪些主要特征呢?

1.2.1 部首在整字中的位置大体一致

部首在整字中的位置比较一致,是部首的主要特征之一,如《说文·示部》共收以示为部首的字 62 字,有 54 字示旁位于整字左边。《页部》共收以页为部首的字 91 字,有 87 字页旁位于整字右边。《皿部》共收以皿为部首的字 24 字,皿皆位于字形下部。

对于这一现象,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

第一,为什么部首在整字中的位置大体一致?

我们认为这是由部首的本质决定的,前面说过,部首是汉字构形系统化的重要表现,实质上是对字义和字形的系统化和类别化,因此必然要求部首在整字中位置一致,因为这样可以更明显地体现系统化和类别化。

第二,为什么同一部首在整字中的位置没有穷尽性一致,一般会有少数例外?

首先,部首是在汉字构形系统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虽然有集体无意识的支配,但也不可能像人为规定那样严谨一致。其次,汉字的文字构形系统有一个重要形成原则是整字优先(王贵元,2014),即优先考虑单字整字形体的构图合理,比如示部字“祭”,部首“示”位于字形下部,而不是通常的左部,这是因为“示”如果摆到左部,字形整体会成为横长形,不符合汉字整字形体早期竖长型和后期方形的统一标准。其他如“紫”“祭”等皆同此理。

第三,为什么同是部首,有的部首以位于字形左部为常态,有的部首以位于字形右部为常态,有的部首以位于字形下部为常态,有的部首以位于字形上部为常态?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原因有多种,有的是因为构件形体特征与组合关系,如“宀”“穴”等部首,形体呈内空形,与其组合的构件便填于其中。有的部首的位置与其功能是相关联的,如“収”,在构字中表示双手捧托,自然会在字形的下部。“页”“欠”等位于字形右部,则又与字形方向和书写生理习惯有关。左右结构的字形部首一般位于字形左部,因为左部是形体的起始端,标类的形体位于起始,能显示统领作用。但有的构件形体有方向性,在字形表示物象阶段,需要面对另一个构件,如:

表 1 有方向性构件的组字情况

姓		妹	
媠		牧	
剿		畋	
役		設	

上述字形中的构件“女”“支”“力”“爰”都是有方向性的构件,它们在构字时,无论位于左边还是右边,都一定是面对另一个构件。这类有方向性的构件,虽然在字形中可以或左或右,但总体来看,绝大多数是位于字形右部,我们分析,这与生理习惯有关,如果是在左边,就要反写,不符合书写的生理习惯。后期字形大多是前期字形的承继,字形承继下来,因此多数有方向部首就位于字形的右部了。

1.2.2 部首兼顾形体和功能

部首的功能指部首参与整字构义的职能。文字学的部首都是既考虑形体又考虑功能的,这是和检字法部首的最大不同,检字法部首有的是只考虑形体而不考虑功能,正因为部首有构形和构义的双重职能,才具有了类化字形和类化字义的作用。《说文·叙》说:“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说明部首都是能参与构义的。

1.2.3 部首的功能

部首的功能总体上可分为单义功能和类义功能两类,一般部首都兼有这两种功能。单义功能是指部首以单一的、具体的意义参与构义,一般是其本义。类义功能是指部首以类别性、抽象性的意义参与构义,以《说文·牛部》为例,部首“牛”以单义构字的有:

- | | |
|----------------------|-----------------------|
| (1) 犊,牛子也。从牛,溲省声。 | (2) 犛,三岁牛。从牛,参声。 |
| (3) 牺,四岁牛。从牛,从四,四亦声。 | (4) 牟,牛鸣也。从牛,象其声气从口出。 |

以类义构字的有:

- | | |
|--------------------|------------------|
| (5) 牡,畜父也。从牛,土声。 | (6) 牝,畜母也。从牛,匕声。 |
| (7) 犧,宗庙之牲也。从牛,義声。 | (8) 犗,畜牲也。从牛,產声。 |

以单义构字的部首“牛”是以其本义来构字,而以类义构字的部首“牛”则是以“牲畜”义来构字。又如部首“足”,以单义构字的有:

- | | |
|-------------------|-------------------|
| (9) 跟,足踵也。从足,艮声。 | (10) 踝,足踝也。从足,果声。 |
| (11) 跖,足下也。从足,石声。 | (12) 跣,一足也。从足,奇声。 |

以类义构字的有:

- | | |
|--------------------|-------------------|
| (13) 蹶,行平易也。从足,叔声。 | (14) 躅,行兑。从足,瞿声。 |
| (15) 蹠,长胫行也。从足,昔声。 | (16) 蹠,疏行兑。从足,禹声。 |

以单义构字的部首“足”是以其本义“脚”来构字,而以类义构字的部首“足”则是以“行走”义来构字。

2. 部首形成的途径

我们的研究发现,汉字构形中对字义和字形的类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现象,就等级而言,汉字构形存在初、高两级。初级构形是仅专注于字形个体及其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高级构形是关照到字形群体的系统化和类别化,以及对字形群体的表现对象进行分类。初级构形是汉字早期阶段的特征,高级构形是汉字后期阶段的特征,汉字构形系统经历过由初级构形向高级构形的发展过程,作为字形字义类化标志的部首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早期汉字是以物象为依据构形的,大多为象形字。物象的具体性决定了汉字构形的具体性,物象丰富多彩,字形也多姿多态,所以这时的汉字构形必然呈现出只重个体而难以顾及群体系统性的特征,因此汉字初级构形阶段的存在盖起因于字形表示物象。表象受制于背后的支配者,这是普遍的道理,因而由初级构形向高级构形的发展,其决定性因素是字形由表示物象向表示词的音

义的转化,①与物象相比,词的音和义都是抽象的,依据其构形的汉字形体即可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极度具体性,对不同的单字群体建立不同的字形分类标志,同时对字义系统进行分类。

分析早期的汉字构形,可以发现一批构字量较多的构件,如口、耳、止、人、女、示、手、木、支、火、水、宀、牛、马、鸟等,这些构件皆发展成了后期汉字的部首,虽然还不成系统,但是汉字部首体系在汉字早期即有一定基础是可以确定的。那么是不是汉字构形一开始就有了字义和字形类化的意识?其实不然,虽然现象近似,性质却截然不同。早期汉字的这种现象并不是由字义和字形类化的意识决定的,而是依据物象构形产生的自然结果,依据物象构形,熟悉的物象易被选用,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因而人身的人、女、口、耳、足、手、首等皆成为多用构件。“远取诸物”是相对于人体本身而言的,也不会太远,因而人们日常生活常接触的事物水、火、木、禾、牛、马、宀等成为多用构件。这些多用构件虽不是部首,但却是部首形成的基础,这是因为部首的主体形成方式就是使初始的多用构件更加多用,也即增加多用构件的构字量,使其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展。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使更多的单字形体归属到多用构件下,从而以多用构件为分类标志,使整个单字群体形成有限的形体类别。当这种多用构件的使用范围扩展到一定程度时,汉字构形系统的部首体系即正式形成。多用构件扩展的具体途径主要有添加、选定、改造和新生四种:

2.1 添加

即添加多用构件。如:

添加“示”：“福祿”之“祿”，甲骨文、西周和春秋金文用“录”，后加“示”旁造专字“祿”，大约出现在战国晚期，战国玺印、睡虎地秦简有“祿”。“祖先”之“祖”，甲骨文、西周和春秋金文用“且”，后加“示”旁造专字“祖”，从现有材料看，春秋中期出现“祖”，但到春秋晚期，“且”仍比“祖”常见。祭，商代字形无“示”旁，西周时加“示”。

添加“言”：“诺”，春秋早期出现，之前用“若”，如西周留鼎。

添加“糸”：“终”，战国以前用“夂(夂)”，战国早期增“糸”旁，见曾侯乙墓竹简。纪，首见于战国中期郭店楚简，之前用“己”。織，首见于战国晚期睡虎地秦简，之前用“戠”。

添加多用构件,有些属于增强字形的表义功能,有些属于为区别表词功能进行的字形派生,派生即产生新字代表新词,基本目的虽然不同,但形式都是多用构件的进一步扩展使用。

2.2 选定

部首的形成过程是与整个汉字构形系统的发展过程相统一的,也就是说部首的形成过程也是汉字形体的定形过程,比如商代和西周字形一字异体众多,或构件多少不同,或构件位置不同,这是由于字形表示物象决定的,随着字形由表示物象向表示词的音义的转化,单字形体逐渐由多形发展为单形,在这一过程中,保留哪些形体、淘汰哪些形体,即与部首有关。向部首发展的构件,往往会在构形位置上走向统一。如:

表2 “祀”“福”字形发展表

	西周	春秋晚期
祀	祀 示	祀
福	福 福 福 福 福 福 福 福	福

① 关于古今汉字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字形表示物象向字形表示词的音义转化的论证,详见王贵元(2010)。

2.3 改造

改造是对原有字形的改进,大多针对的是完全没有构字能量或构字能量低下的独体字,也有少数为派生新字。单因一个字形增加整个构形系统的基础构形元素是系统不科学的表现,改造即可使孤立构形成分归入序列中。改造分整体改造和部分改造两种。

2.3.1 整体改造

表3 “祗”“塘”字形发展表

	商代	西周	春秋	小篆
祗				
塘				

祗、塘二字在战国以前为独体象形字,小篆另起炉灶,分别改造为“示”部字和“土”部字。

2.3.2 部分改造

表4 “鼎”字形发展表

	商代	西周	战国
鼎			

鼎字商代、西周形体为独体象形形体,战国时期第一个字形是将原形体中鼎的腿部象形成分改造成了“皿”,“皿”是一个类化构件,意在表明鼎属器皿一类,新形应解释为从皿、鼎省声。战国时期的第二个字形是将原形体中鼎的腿部改造成了“火”,古代鼎是腿部用火的煮肉器具,故“火”也可参与构义。^②

嘗,《说文·旨部》:“嘗,口味之也。从旨,尚声。”本义为品尝,后引申指秋祭,因为秋祭的核心程序是品尝新谷。《尔雅·释天》:“秋祭曰嘗。”郭璞注:“嘗,嘗新谷。”《白虎通义·宗庙》:“秋曰嘗者,新谷熟,嘗之。”后改义符“旨”为“示”,派生“崇”字,此形出现在春秋时期,是秋祭的专用字。

2.4 新生

指新产生的字形采用多用构件组字,此不赘述。

3. 构形功能的发展

在早期汉字形体中,构件的构义功能都很具体,多为单义构件,后期字形则多为类义构件,后期除新生字形采用类义构件构字外,对早期字形单义构件的改造是构形功能发展的重要途径,其方式主要有两种:转化和替换。

^② 有一种观点认为,鼎、𩚑先省作𩚒形,再添加意符“皿”旁而成𩚓形。我们不这样认为,原因有二:其一,𩚒只出现在战国楚简文字中,学界公认这是贞字,参看《楚文字编》210页、《战国文字编》212页。《楚文字编》438页鼎字下没有这一字形、《战国文字编》477页鼎字下也没有这一字形。既然是贞字,那么增加“皿”就完全没有可能,因为“皿”不能参与“贞”字构意,在古文字阶段,增加一个与本字字义毫无关联的偏旁还没有先例。其二,如果认为是增加偏旁而成,那么必须要证明鼎、𩚒、𩚓属于三个阶段,也就是说要证明有一个阶段只存在𩚒,而不存在鼎等鼎字字形,才能说后出的𩚓是增加“皿”形成的,但事实上与𩚒同时存在有大量鼎字形体。从西周开始,汉字开始了对象形形体的改造,鼎字的腿部属于不常见象形形体,改造为“皿”和“火”符合很多不常见象形形体的发展规律,也符合独体象形改造为合体的字形发展规律。

3.1 构件由单义转化为类义

原是单义的构件,在字形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为表示类义的构件,当这种转化完成之时,部首即正式产生,如甲骨文的“牡、牝、牢、牧”等字,各有不同形体。

表 5 甲骨文“牡”“牝”“牢”“牧”字形表

甲 骨 文	从牛				
	从羊				
	从豕				
	从马				
小篆	从牛				
楷书	从牛	牡	牝	牢	牧

这些不同形体的字义是各有差异的,从牛从土者为公牛,从羊从土者为公羊,从豕从土者为公猪,这一点前辈著名学者已经提出过,杨树达(1954:3)说:“盖以《尔雅》:《释兽》、《释畜》及《说文》:《牛部》、《马部》诸文观之,物色形状,辨析綦详,事偶不同,别为一字,盖畜牧时代之残遗也。假令牛羊鹿犬种类各殊,只以牝牡相符,即为一字,以此校彼,详略悬殊,揆之事情,殆不当尔。说母牛为牝,母鹿为麀,牝麀既不同文,牡牡麀牡安能为一字?”容庚、瞿润缙(2011:125)说:“宰,诸家以为牢字,未谛从牛与从羊不同。从羊者大概皆为小宰,而小宰之宰未有从牛者,知宰牢有别。”徐中舒(1989:82-83)主编《甲骨文字典》:“卜辞中牢、宰二字各有专指:‘牢’为经过专门饲养而用作祭牲之牛,‘宰’为经过专门饲养而用作祭牲之羊,旧说‘牢’即包括牛羊豕之大牢,‘宰’为包括羊豕之小牢,并不符合殷代实际。”

证之甲骨卜辞,确有牡、牝等并列的文辞,可证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 (17) 乙巳贞,丙十彤,奉生于妣丙,牡三、牝一、白……(《甲骨文合集》34080)
- (18) 辛巳贞,其奉生于妣庚妣丙,牡、牝、白豮。(《甲骨文合集》34081.2)
- (19) 辛未卜,卯于祖,牝、牡。(《甲骨文合集》22101.1)
- (20) ……贞……奉生于……庚妣丙……牝、豮。(《甲骨文合集》34081.3)

以“牡”“牝”为例,当汉字发展到只以“牡”“牝”表示公母,而其他字形被淘汰时,“牡”“牝”中的构件“牛”即由原功能“牛”发展为“牲畜”,“牛”也由单义构件转化为类义部首。

3.2 单义构件替换为类义构件

在字形表示物象阶段,字形以能够反映物象为唯一目标,这时构形的系统性体现在字形与物象的密切关系上,字形本身的系统化并不是考虑的目标。

随着汉字构形的进一步发展,构形本身的系统化成为构形系统发展的重要目标,因为构形的系统化可以使汉字的识读和书写更加便利和有效,减少识读和书写的难度。系统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构件的类化,类化实质上是对字义和字形的归类,同时减少构字能量低下的构形成分,使系统更加科学。例如:

表 6 “凤”“鸡”字形发展表

	甲骨文	小篆
凤		
鸡		

凤字甲骨文的左旁是凤的整体象形形体,为单义构件,小篆改从鸟,替换成了类义构件。鸡字甲骨文的右旁是鸡的整体象形形体,为单义构件,小篆改从隹,替换成了类义构件。

再如“屯”,《说文·中部》:“屯,难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中贯一。一,地也。尾曲。《易》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

表7 “屯”字形发展表

屯	商代	西周	春秋	小篆
				

高鸿缙(2008:223)说:“按此字初形象艸木初生根芽而孚甲未脱之形,故说以寄难生之难。”有壳植物种子在土中是先向下生根,然后其茎戴着孚甲破土而出,象甲骨文之形,甲骨文字形下部的一横表示地面,原本是一个独体象形字,此后字形中表孚甲的部分演变为一横,其余类化为类义构件“中”,故《说文》曰“从中贯一”。

4. 部首的发展阶段

4.1 前部首时代

部首是汉字造字时就有还是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我们曾以甲骨文为对象,尝试归纳其部首系统,结果是不成功的,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甲骨文有众多不具备构字功能的象形独体,即没有作为构件参构过其他字形的独体,如甲骨文字形“帝、祗、琮、筮、蔡、若、周、岁、盾、箕、廬、射、檉、橐、穆、裘、髦、豹、雷、臧、播、或、戚、瑟、發、饗、虹、螳、蝠、蛛、龜、壙、助、禽、麋、獬、須、爾、秋、臺、髭”等。举例如下:

表8 甲骨文独体例示

楷体	帝	祗	琮	若	周
甲骨文					
楷体	檉	橐	穆	裘	髦
甲骨文					

这些独体归不到别的构件下,只能当作部首看待,如此则无从字部首太多,部首也就失去了其字义字形分类的核心价值。

第二,部首系统不完善,存在大量未派生字形,如豊(禮)、录(禄)、羊(祥)、且(祖)、夆(祭)、帝(禘)、复(復)、藿(觀)、酉(酒)、冬(终)、宾(嬪)、匕(妣)、專(搏)、乍(作)、鬲(鄙)、鄉(饗)、易(赐、賜)、每(晦、梅)、叡(微)、吏(使)、卜(外)、白(伯)等。

第三,甲骨文字形大多构件的位置不固定,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没有主次之分,没有构件能够体现字义字形的分类功能。

第四,甲骨文许多字形的构件的数量和种类不固定,难以确定部首。如:

表9 甲骨文“出”“御”字形表

出	
御	

第五,甲骨文构件基本是单义构件,少有作为部首首要特征的类义构件。

为什么甲骨文难以归纳部首?主要原因是商代甲骨文是典型的字形表示物象时期,这时

識、誠、課、試、說、誣、詞、誦、諄、訝、詔、詐、誣、謗、誤、訾、訐、譴、讓、辭、詰、詢、誘、訊、殿、殺、收、斂、瞋、眯、雅、菁、脣、腎、臚、股、脚、胎、脫、跌、隋、脯、膠、腔、筋”等。这些字大多是为区别词义而增加义符形成的分化字,实际上是进一步完善了字形系统和词汇系统的对应关系。

第三,睡虎地秦简单字形体与此前的秦文字同一单字形体区别明显,显然经过简化和类化等改造。

表 11 秦文字形体对照表

商	 秦公罇乙	 睡虎地秦简
讯	 秦不其簋盖	 睡虎地秦简
夏	 秦公簋盖	 睡虎地秦简
帅	 秦公簋盖	 睡虎地秦简
宜	 秦公簋器	 睡虎地秦简
歸	 秦不其簋盖	 睡虎地秦简
是	 秦公簋盖	 睡虎地秦简
若	 诅楚文	 睡虎地秦简

上述字形改造,“商”“宜”“夏”是明显的简化,其他字形多是构件的类化,即排除罕见的、象形性强的构件,如“若”排除了一人双手顺发的罕见象形构件,“是”改为从日从正的两个常见构件,排除了原形中上部的罕见构件,“讯”字改为从言从𠄎的两个常见构件,排除了原形中的罕见象形构件,“帅”“歸”都是用形近的“自”替换掉了原有的罕见构件。

不其簋的年代是秦庄公继位前(前 822 年之前数年),秦公罇的年代是秦武公初继位时(前 697 年之后不久),秦公簋的年代是秦景公初继位时(前 576 年之后不久),诅楚文的年代是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前 312),睡虎地秦简的抄写时代,陈伟(2014:序言 3)认为是战国末期秦王政时期,从“吏”与“事”、“卿”与“乡”、“酉”与“酒”、“赏”与“償”等字的使用看(参看陈侃理,2014),陈说是正确的。

从以上特征看,战国晚期的秦系文字更像是整理和规范过的文字,赵平安(1994)曾撰《试论秦国历史上的三次“书同文”》,认为第一次是《史籀篇》,第二次是战国中期开始,“随着兼并战争的展开,秦国便把自己的综合性通用文字不断地推行到所占领的地方”,第三次即秦统一后用小篆来统一全国用字。他所说的秦在战国时期的书同文是指把秦文字推广到被占领国家,这与对秦文字的整理和规范还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认为战国晚期秦国对秦文字确实进行过整理和规范。

秦国从公元前 230 年兼并韩国开始,历经 10 年统一了全国。由于分裂割据,战国时文字从字形到字用各国皆有差异,所以兼并异国之后有推行秦文字的必要。但是,要推行一种文字,其文字系统本身必须相对规范,不然则会给推行造成许多麻烦,不宜顺利推广,我们认为这就是秦国对秦文字进行整理和规范的动因。由此推断,秦文字的整理和规范应当在兼并韩国前后的秦王政时期。^⑤从秦系文字历史看,整理的幅度不是很大,且属于众诸侯国并立之时的一国之事,故未被充分重视,正史缺载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次文字整理实际上并非没有记

^⑤ 秦国从公元前 236 年开始,即攻战或获取了赵、韩、魏部分土地。

载,只是以前一直当传说看待,没有特别重视。张怀瓘《书断》上:“蔡邕《圣皇篇》云:程邈删古立隶文。”卫恒《四体书势》:“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说文·叙》:“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对于“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一句,段玉裁注:“按此十三字当在下文‘左书即秦隶书’之下,上文明言李斯、赵高、胡毋敬皆取史籀大篆省改,所谓小篆。则作小篆之人既显白矣,何容赘此自相矛盾耶?况蔡邕《圣皇篇》云:‘程邈删古立隶文。’而蔡琰、卫恒、羊欣、江式、庾肩吾、王僧虔、郢道元、颜师古亦皆同辞,惟传闻不一。”结合字形系统的变化来看,东汉时著名学人许慎和蔡邕所言不虚,秦整理过隶书是不应怀疑的。以上材料说明秦整理隶书是在秦始皇时期,由于秦统一全国后只记载整理过小篆,无疑秦整理隶书是在秦统一之前的秦王政时期。“始皇帝”虽是秦统一后定的称号,但后世称谓往往统一前后不加区别。

如果以上论证属实,那么,文字学上一直存在的一个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个疑问就是秦统一全国后既然整理文字,为什么不同时对广泛使用的隶书进行整理?因为从秦统一全国后,即书同文后的大量出土简牍看,秦书同文后普遍使用的依然是统一前即已通行的隶书而非小篆。我们认为,秦统一后不整理隶书是因为隶书已经整理过,没有必要再进行整理。小篆的整理更多的是为了凸显地位和权力,就同秦统一后“王”改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等类似。

秦王政时期的秦系文字整理,首先是消除了大量异体字,解决了部首难以确定的问题;其次是通过增添义符的方式产生大量合体字,拓展和完善了部首体系;再次是通过改造和新生等方式一方面排除了不符合组合性文字系统的单字形体,另一方面类化构件,正式完成了部首体系的建设。因此可以认定,战国晚期是汉字部首体系正式形成的时期。

参考文献

- 陈侃理 2014 《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文物》第9期。
 陈伟(主编) 2014 《秦简牍合集》(壹)上,武汉大学出版社。
 高鸿缙 2008 《中国字例》,三民书局。
 蒋玉斌 2014 《释甲骨文中的“獨”字初文》,《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辑。
 李守奎 2003 《楚文字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容庚 瞿润缙 2011 《容庚学术著作全集:殷契卜辞》,中华书局。
 汤余惠 2001 《战国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王贵元 2010 《汉字形体演化的动因与机制》,《语文研究》第3期。
 王贵元 2014 《汉字笔画系统的形成过程与机制》,《语言科学》第5期。
 王力(主编) 1981 《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二册,中华书局。
 徐中舒(主编) 1989 《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杨树达 1954 《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中国科学院出版。
 赵平安 1994 《试论秦国历史上的三次“书同文”》,《河北大学学报》第3期。

王贵元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wgy1004@163.com

SHEN Ming, AKITANI Hiroyuki, The transitional nature of the Lüliang cluster of the Jin group in western Shanxi Province

The Lüliang cluster of the Jin group, consisting of the Fenzhou and Xixian sub-clusters, is spoken in western Shanxi and northern Shaanxi.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transitional nature of the Lüliang cluster by considering three phonological aspects. The conclusions are: 1) the modern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of the MC voiced initials in Lüliang is the same as that of Central-plain Mandarin; 2) with respect to the modern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of the MC Zeng-geng groups, the Fenzhou sub-cluster is the same as the Bingzhou and Wutai clusters of the Jin group, and the Xixian sub-cluster is the same as Central-plain Mandarin; and 3) Lüliang shares the same citation-tone system with the Wutai cluster. The Lüliang cluster shows continuous and transitional nature in both phonological feature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Key Words: Lüliang cluster in western Shanxi Province, modern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of the MC voiced initials, modern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of the MC Zeng-geng groups, citation-tone system, transitional nature

CHEN Xiao, Tonal variations of the Beijing dialect in Late-Qing Times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a critical period from the Late-Qing Times to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Beijing dialect. Based on domestic and oversea materials,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onal system of the Beijing dialect since the Middle-Qing Times. It is found that a number of tonal variations appeared in the Beijing dialect during this period. For example, the even tone has undergone a shift from HM/HH to HH and the departing tone from ML to HL.

Key Words: Middle-and-Late-Qing Times, Beijing dialect, tone, variations of tonal value

LI Ruya, Children's acquisition of the blocking effect on reflexive binding

In this paper, an experimental study is conducted to show that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 around the age of 4 demonstrate adult-like judgment of the blocking effect on the long-distance (LD) binding of the reflexive *ziji* (自己) 'self', though they demonstrate non-adult-like preference on the choice of antecedents of *ziji* within the local domain. Following Progovac (1992), the local domain is defined by the formation of the AGR chain.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the LD binding within the local domain from that outside i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nature of children's knowledge of the reflexive binding. Following Hu (2002), it accounts for children'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flex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ity and prominence. Children's adult-like judgment on the blocking effect manifests their knowledge of locality, while their non-adult-like preference on the choice of the antecedents indicates that they have not fully acquired knowledge of prominence in grammar, which develops over time due to its interface properties as determin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yntax, semantics, and discourse (Hu, 2002).

Key Words: *ziji* (自己), long-distance binding, blocking effect, INFL acquisition, locality, prominence

WANG Guiyuan,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radical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radical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volves the categorization of graphemes and their meanings. These radicals, by nature, can be viewed as symbols of categorization. Four methods are adopted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radical system, namely, addition, selection, reformation, and cre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the literal meaning represented by componen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was unique and specific, while in later stages, these components were developed to represent the meaning of their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and substitution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is development of function changing. Not existing originally,



radicals gradually came into being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construction system.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Qin-State bamboo slips from Shuihudi in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re standardized serves as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 proposal that Qin standardized the clerical script, and also accounts for why the Qin Dynasty standardized the small seal script rather than the clerical script after its 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rad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ZOU Hu, Six notes on folk characters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Sui Dynasty

The Sui Dynasty saw 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he stone folk characters, producing a large quantity of variants and erroneous characters. Quite a number of those characters are of odd shapes and can only be found in this period, and thus are valuable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Nonetheless, the folk characters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Sui Dynasty have not been given enough attention in academia and so far only limited studies have touched on this topic.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six knotty characters, so as to correct previous interpretation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script and dictionary revision.

Key Words: inscription of the Sui Dynasty, folk character, textual research

LIANG Chunsheng, Notes of some knotty characters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meanings of many knotty characters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re still open to debate and deserve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knotty characters and proposes new interpretations of 17 characters of this type.

Key Words: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nscription, knotty character

CHE Shuya, ZHOU Qiong, On the time-point words in Chinese newspapers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years of Late-Qing Times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In Chinese newspapers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years of Late-Qing Times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time-point words mainly include date words, week words, hour words and general time words. Each type of time-point words has its concrete and rich forms of expression. The diachronic changes in these temporal words have gone through such a process in which one or two forms of an expression appear first, then new forms of the expression appear, but without a high frequency of use. Next, the new and old forms are used simultaneously. Finally one form of expression becomes the major form of expression, while the other has reduced frequency of use or basically no longer appears. Besides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this diachronic change in temporal words is a result of code switching and code mixing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contact. There are a variety of codes in the Singaporean society, including English, Chinese dialects, modern Chinese Mandarin and Bahasa Melayu, which exert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time point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newspapers in Singapore from the final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different code switching of time point words with the same syntax structure includes inner-sentence switching and inter-sentence switching, a smooth switching and vocabulary convergence type switching. Usually, inner-sentence switching appears first, then inner-sentence switching and inter-sentence switching coexist and finally inter-sentence switching becomes dominant.

Key Words: Late-Qing Times,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newspapers in Singapore, the time-point words, code mixing and switching

